

江 西 古 文 精 华 丛 书

史学卷



主编 周奎书 姚公骥

江西古文精华丛书

史学卷

周秋生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西古文精华丛书·史学卷/周秋生

—江西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6.11

(江西古文精华丛书/周奎书)

ISBN 7-210-01726-7

I. 江…

II. 周…

III. 史学史,江西古文,精华—历史

IV. K092

江西古文精华丛书

史学卷

周秋生 选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1.25

字数:300千 印数:1—1200册

ISBN 7-210-01726-7/K·200 定价:22.00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新魏路5号

邮政编码:330002 电报挂号:3652 电话:8511534 (发行部)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《江西古文精华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主编 周銮书 姚公骞

编委 左行培 刘芳圣 刘学经

李国强 吴大逵 周銮书

周榕芳 胡迎建 姚公骞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常务编辑 刘凯军

《江西古文精华丛书》总序

周銮书

江西古称“文献之邦”，又称“文章节义之邦”。江西人善于写文章，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富有盛名，这是早已定论，无待赘言的了。据研究江西历史的学者统计，自唐代以来，江西有一万一千一百余人中进士，四十六人中状元；自汉代以来，有五百余人上列传，四十八人任宰辅（据李天白先生统计，江西有宰辅六十二人，其中宋代四十一人，明代十七人，清代四人，南唐、吴越的宰辅还没有计算在内）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不少人于为官之余，致力学问，或未入仕途，而以著述为生。因此，历朝历代，他们留下了大量作品，从东汉至清代，累计各类文集达万部，这是他们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的精神文化财富。当然，因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会有不少糟粕，需要摒弃，但大量的却是珍宝珠玉，有待我们去发掘、抢救、收集、整理、研究，并加以继承和发扬，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。

面对这一大笔极其丰富、极其广博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即使有人想尽毕生之力，也只可能阅读其中的若干分之一。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遗产，我们邀请了一批有志于整理江西古籍的专家，毕数年之功，从浩如烟海的大小文集中，分门别类，选为十二卷，每卷约三十万字。选编涉及的时间范围，上起东晋，下迄晚清。所选作品，简介作者生平，阐发文章大意，注释疑难字句，使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朋友，能够较为顺利地阅读。

这十二卷本的排序,未分先后,各卷的主要内容大致为:

《哲学卷》。中国古代士人,包括江西士人,没有称之为哲学的专门著作,我们只能从佛、道、儒三家作者的经、论、赞、疏、讲义、注释、语录、信函中寻找。这些经、论,探宇宙之生成,究人世之奥秘,穷理尽性,博大精深。佛都净土宗和禅宗各派,道教陆修静和正一派,儒学新阶段的宋明理学,包括朱熹和陆九渊等的各种观点,以及王安石、李觏、罗钦顺、何心隐等有关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述,均囊括其中。江西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,尤其是东晋、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的一千三百余年间,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。《哲学大辞典》收江西宋明时期哲学家五十人,占全国同期哲学家的六分之一。江西哲学家的许多论述,不仅影响江西佛道和士人的言谈举止,而且往往成为全国性的教仪轨范和行为准则。

《史学卷》。“二十四史”中由江西人担任总裁编撰官的,占了五史。“三通”的作者,江西人占了“一通”。《册府元龟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经世大典》、《永乐大典》等大型巨著,多为江西人主编,或为重要编撰者。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的各朝实录,有相当的部分为江西人任总裁,如清代朱轼就曾经总裁《圣祖实录》和《世宗实录》,而曾巩一人还一度典修北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五朝国史,并校定南齐、梁、陈三书。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,也赖曾巩的编校,得以流传不坠。还有刘恕的《通鉴外纪》、刘敞的《东汉刊误》、刘敞、刘敞、刘奉世合著的《三刘汉书标注》、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都是史学名著。尤其是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朱熹以及清代魏禧等人,就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所写的专论,精湛透辟,极富新意,为历来所传颂。《史学卷》中的文章充分说明,江西不仅多文士,多哲人,而且多良史。

《奏议卷》。古代臣属向帝王上书、进言的文稿,称为奏议。包括章、表、奏、疏、议状、对策、封事、札子、折子、弹章等,实是古代的政论文。现在能够见到江西人写的奏议,最早的是东晋,大量的在

宋、明两代。有许多高屋建瓴、惊世骇俗之作，如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，是揭示人臣有忠奸之分而君子有朋、小人无朋的奠基性作品；王安石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即历史上著名的万言书，是他主张改革的长篇檄文，确立了他变法的思想基础。胡铨的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，是冒着流放、坐牢以至杀头的危险，反对投降、坚持抗敌，充满正义和爱国激情的千古绝唱。文天祥的《已未上皇帝书》，是他中状元后尚未授官时的长篇奏议，全面详尽地论述了救亡图存的各项主张，悲愤忠贞，慷慨激昂，光照日月，文如其人，是感天地、泣鬼神、爱国救民的杰出篇章。解缙的《大庖西室封事》，反对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，苛税重赋，要求先仁义而后法制，忠心耿耿，抗直敢言。如此等等。安福人刘球，为上《边防事宜疏》，触怒了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，结果被害狱中，为这一篇奏疏而付出了血的代价。从选入的这些奏议中，可以了解古代江西士大夫的为国忠心和他们的政治谋略、思想品德、精神风貌、学识见解。虽然这都是过去的事，但对于今天的从政者，不无启示和教益。

《诗词卷》。江西出了许多诗词大家，陶渊明是田园诗人之祖，隐逸诗人之宗。欧阳修“以文为诗”，王安石“借事发明”，寓理于诗，二人奠定宋诗一代的根基。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的领袖。杨万里创平易自然的新体。文天祥为爱国诗歌的楷模。虞集、揭傒斯、范梈为元诗“四大家”之三。蒋士铨为清诗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。陈三立为“同光体”的执牛耳者。晏殊、晏几道、欧阳修为宋词“四大开祖”之三，开创西江词派先河。姜夔为南宋词坛格律派大师。元、明两代江西词曲家辈出，多有佳篇。江西诗词在许多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，在全国占有独特的地位。《诗词卷》不仅给予艺术的享受，还为研究提供了素材。

《散文卷》。江西是散文的故乡。唐宋八大家，江西欧、曾、王占了三家。欧阳修是散文运动的领袖，主张文以明道，要求“事信、载大、言文”。他的散文平易自然，流畅婉转，为历代所宗法。曾巩散

文,朴茂典雅,平正条达,多为后人所仿效。王安石主张文贵致用,反映了改革家的要求。他的散文,雄奇峭拔,谨严精辟,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力,较之欧、曾,另是一种气势。从此,江西散文以欧、曾、王为师法。南宋有胡铨、周必大、文天祥、刘辰翁、谢枋得、王炎午等诸家,他们处于国家危亡之秋,为文深沉哀痛,悲愤激越,多为爱国主义篇章。元、明、清三代,代有传人。至清代魏禧、李绂之文,仍崇尚雄健浩瀚,不失欧、王遗风。

《游记卷》。读万卷书,走万里路,是中国文人的志趣和传统。《游记卷》收集江西作家游历名山大川、古迹胜境的作品。有描述省外的,多是反映省内的。有早已脍炙人口的佳作,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、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、朱熹的《百丈山记》,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作品,如杨家曙的《游章水源记》、《洗心潭记》,写得玲珑剔透,雅有风致,与名家大作并列,毫无逊色。这许多游记,不仅语言优美,记叙生动,寻幽探险,引人入胜,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地理价值,而且,作者不时在描绘铺陈之间,寄托遐思,抒发情感,致性灵于草木,寓哲理于山水,于登临游憩之中,畅论文章学问,给人的启迪既广阔又深远。

《序跋卷》。序跋有如今日图书中的前言、后记,是对书文的旨意、内容、价值予以说明、介绍和评论的一种文体。序跋与文集之间,犹如人体之与眉眼,商店之与橱窗。以短概长,以少御多,收提纲挈领之功,起画龙点睛之妙。江西人撰写的序跋,首推欧、曾、王。他们为史传评论所作的序,无论宏篇巨制,还是精萃短简,均被视为范文。此后各代诗书序跋,或推论本原,广大其义;或阐发幽微,自序其意,多有可观可采者。

《碑记卷》。古人在石上镌刻文字,最早是作为标记、告示或纪念物,后来发展到在石碑上刻字立传记事。我们的《碑记卷》意在收集刻在石碑上的优秀文章。如曾巩《宜黄县县学记》、《徐孺子祠堂记》、王安石《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》等,都是碑记中的名篇。碑记撰

写者,大都为名家,多是具有较高或相当身份、地位、学识、见解者,因此,碑记多健笔,墓志有华章。《碑记卷》中许多精心之作,不仅文意高雅,遣词俊洁,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价值。

《笔记卷》。笔记是一种随笔记录,不拘形体的作品。她横涉东瀛西域,纵贯唐宋元明。天地鬼神,无所不谈;君臣将相,概不忌避。街巷议论,尽可入选;朝野传闻,均能上书。无须修饰,真情得以披露;不受限制,思路随意驰骋。以至梦呓化为隽语,幻觉竟成妙谛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人物、掌故、风俗、民情,包罗万象,无所不备,是一面历史的大镜子。王定保的《唐摭言》、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、惠洪的《冷斋夜话》、洪皓的《松漠纪闻》、洪迈的《夷坚志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、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等,都是笔记中的佼佼者。《四库提要》评价《容斋随笔》:“南宋说部,当以此为首。”毛泽东对《容斋随笔》特别钟爱,成为他的案头书。

《书信卷》。从书信这一侧面,可以窥见古人的思想政治面貌、品行道德风范、为人处世哲学、从业研读精神,以及生活起居习俗,较之说佛谈玄的论述、议事参政的奏疏、格物致知的学理、评古论今的史传,更为随意挥洒、舒卷自如、活泼生动、真实感人。其语言辞藻、风格韵致,又是一个世界,是了解古人、研究古人的一个重要渠道。如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、《与尹师鲁书》、曾巩《寄欧阳舍人书》、王安石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、洪皓《使金上母书》、谢枋得《与李善吾书》、罗钦顺《答欧阳少司成崇一》等,均是书信中的上品。《书信卷》收集的长短书信,值得欣赏玩味,参阅借鉴。

《科技卷》。在古代科学技术领域,具有非凡才智的江西人民亦创造了辉煌的成就。德兴冶铜,景德镇范陶,樟树制药,河口造纸,永平铸钱,南康造船等等,都各领数百年风骚;以曾安止、曾民瞻、陈自明、张潜、朱思本、赵友钦、危亦林、吴昊十九、徐贞明、宋应星、揭暄、喻嘉言、齐彦槐等为代表的历代科学家和能工巧匠,他们遗下的科技著作如《禾谱》、《浸铜要略》、《輿地图》、《妇人大全良方》、

《革象新书》、《梭山农谱》、《潞水客谈》、《天球浅说》、《璇玑遗述》等等,尤其是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农业、手工业技术百科全书的《天工开物》,均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。他们百折不挠,追求真理,勇于发明创造的精神,对今天来说,仍是一笔丰赡的遗产。

《经济卷》。江西古代贤士大夫怀抱“兼济天下”的夙志,他们或为宰辅,或为守令;或居庙堂之高,或处江湖之远,但都无不关注国计民生,致力于发展生产,改革财政。他们或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,或就具体的经济问题制订和实施改革措施。王安石变法,提出“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”的理财方针,推行“均输法”、“市易法”、“方田均税法”、“青苗法”等一系列新法。他的《乞制置三司条例》和欧阳修的《原弊》、《论茶法奏状》,李觏的《平土书》、《富国策》,都是宋代极有价值的经济文献。明代夏原吉定赋役之制,成一代之规;周忱创“平粜法”,核减官田赋粮,以苏民困。清代朱轼多次赈济灾民,兴修水利,创营田事例四条,都成效显著。陈炽拟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而作《续富国策》,提出生产是财富之源的理论观点,并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岁月里,豪迈宣称“他日富甲环瀛,踵英而起者”,非中国莫属。读来令人感奋。古代江西名臣对经济和财政问题的种种见解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,但许多见解如以农为本、多种经营、开源节流的思想,仍可资今天经济建设之借鉴。

江西的古代文化,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,在中国悠久而又丰富的古代文化中,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,尤其是在宋、元、明和清前期的七百余年间,明显突出。无论是儒道佛、文史哲,还是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艺术、科技、军事等方面,江西人多富有开拓、进取、变革、创新的精神,使江西在古代文明的许多领域处于领先甚至领袖的地位。

由于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坚毅、顽强的本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,和儒学、道学的传统影响,江西士大夫的坚毅刚正精神、气节

义烈风范,特别鲜明和持久。它必然反映到江西的文风、士风以至民风。江西文风最繁荣昌盛的时候,是在宋代。但洪峰过后,不失滔滔。流风余韵,依旧绵延数百年。这十二卷本收集的文章,宋代的晏、欧、曾、王、黄、杨、朱、陆、姜、文,无疑是卓越、杰出的代表。元、明、清三代,虽少泰山北斗,却也群峰竞秀,繁星映天,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,使我们的十二卷本尽有选择的广阔天地。真正是金玉满堂,目不暇接;而沧海遗珠,也在所难免。这是学力不足,用功不勤所致,不无憾尔。

人无完人,书无全书。十二卷本《江西古文精华丛书》,不可能网罗一切精品,题解、注释也会有不妥之处,请专家、读者多予指正,以便今后能加以补充、修正、丰富和完善,力求达到“精华”二字应有的标准。

在十二卷本《江西古文精华丛书》的编注和出版过程中,我们得到省委、省政府领导同志的关怀、指导,得到省委宣传部、省社联、省社会科学院、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、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,还得到徐琳琳、吴晓丁、汪叔子、胡以申、刘弋涛、毛智勇、赵树贵、罗远东等许多同志的配合和帮助,使这一耗费数年功夫的艰巨工程,得以顺利完成,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。

《史学卷》序

姚公骥

本世纪之初，梁启超在他的《新史学》一书中，曾说到：“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，为中国所固有者，惟史学。史学者，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，国民之明镜也，爱国心之源泉也。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，列国所以日进文明，史学之功居其半焉。”又说：“试一翻四库之书，其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者，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！上自太史公、班孟坚，下至毕秋帆、赵瓯北，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，兹学之发达，二千年于兹矣！”今天看来，梁氏的话基本上还是不错的。他指出中国之传统史学有三大特色：一，为本国所固有，历史最悠久；二，史籍在古籍中份量最重，占百分之六七十；三，史学家代有其人，名贤辈出，累计起来，是一支庞大的队伍，是他国所难比拟的。至如梁氏所提到的关于史学之功用，“国民之明镜，爱国心之源泉”，虽然没有说完全，特别没有提到历史发展的规律——这在梁氏来说，是不可能认识到的，可是，以史为“鉴”，这是中国史学一个优良传统；而尊祖敬宗，化家为国或慎终追远，爱国如家，又是古代由血缘关系扩而廓之为国家关系，从而成了礼与史由之而生的社会基础与观念准则，则梁氏的这一论定直到今天仍然未曾失去它的光采。我们今天还是要弘扬我国史学的这一优良而又悠久的传统，既作为治国的一面“明镜”，又作为激励人民爱国心的“源泉”，我想，这也应该看着是编纂本书的一个目的。

江西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。大体说来，

自东汉始,已有程曾、唐檀、徐稚等传严彭祖、颜安乐两家的《公羊春秋》之学,把盛行于中原的《春秋》史学引入了江南。两晋南北朝期间,则有邓粲(南昌人,一说长沙人)、喻归、熊默、雷次宗、熊襄等人,他们的著作大都专注于地方史,开了江西私家纂述地方志乘之先河。可惜的是,他们的著作都失传了,只有个别的被古代类书摘录下了一点零星断简,才算留下了一鳞半爪。隋唐五代时期,江西史学一度中衰,三百多年间几乎成了空白,只是到了唐代末年和五代南唐期间,南昌才先后出了两个勉强称得上史学家的。一个是著《摭言》的王定保,一个是为续雷次宗的《豫章记》而作《补豫章记》的涂虞,时至今日,这两本书也是一存一佚了。

到了两宋时期,江西的史学突然大放异采,风气所趋,钟毓灵秀,一时大家竞出,联镳并辔,出现了空前的盛况。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说,北宋期间,江西史学以研究、纂述断代史为主,诸如刘敞、刘铨、刘奉世兄弟子侄以研究两汉史学为主,刘恕、刘义仲父子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及隋十朝史为主,而欧阳修则以研究唐及五代之史为主,他们都是卓然不朽的大家。至如陈彭年也是研究唐与五代史的,曾巩是研究北宋当代史的,他们虽也属大家之列,可惜他们的史学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,无法窥其全貌了。南宋期间,江西史学则已转入以研究纂述通史为主,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要推两个人,前为朱熹,著《通鉴纲目》,后为马端临,著《文献通考》。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虽是在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的基础上编成的,然而,他自谓“别为义例,增损掇括,以就此编。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,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,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,亦将慨然有感于斯”!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,这是朱熹最为得意之处,也是对后世最具影响的一端。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,虽然也是在杜佑《通典》的基础上从事纂述的,然而,它不仅在年限与材料上补了《通典》之缺,增加了自唐天宝以后迄于两宋的内容,而且在门类上也由《通典》的十九门,增加到二十四门。《文献通考》的史学价值还在于保存了宋代

许多的重要资料,为《宋史》诸志所未载,其中还有作者写的许多案语,可谓贯通古今,折衷至当,故国之思,溢于言表,尤为价值之所在。当然,南宋之江西史学多贵会通,这也只是就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而言,并不是说,其它方面没有兼顾,其实就以朱熹而论,他对当代史和学术史的研究,也是很有成就的,前者如《宋名臣言行录》,后者如《伊洛渊源录》,都是著名的史籍。此外还有如朱弁、洪皓、洪迈父子,徐梦莘、徐天麟伯侄以及胡一桂等也都是很有名的史学家。他们或用笔记、或用编年、或用会要、通要等体裁,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资料。

元代江西著名的史学家有吴澄和揭傒斯,吴澄是位春秋学家,晚年著《五经纂言》。全祖望曾许为:“草庐(吴澄)诸经,以《春秋纂言》为最。”揭傒斯则是主修辽、金、宋三史的总裁官,可惜的是及其身只完成了《辽史》。尝谓“欲求作史之法,须求作史之意。古人作史,虽小善必录,小恶必记,不然,何以示惩劝!”他在史馆时,“毅然以笔削自任,凡政事得失、人才贤否,一律以是非之公,至于物论之不齐,必反复辩论,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”,可见他是一位正直严谨的史学家。

明代的江西史学又呈中衰之势,没有出什么大家。在二百七十七年中,参加政府修史的不过数人,像危素参加过辽、金、宋三史的修撰,后来有曾鲁和谢一夔参加过修《元史》。至如像胡俨、解缙、杨士奇、金幼孜、胡广、曾棨、李懋、彭汝器、曾彦,以及费宏、费霖兄弟等人,虽都大有名于当时,然而就史学而论,他们都只是先后参加过某朝实录的编纂工作,看不出他们在史学上有什么特别成就。真正值得一提的是陈邦瞻,他在冯琦和沈越两人未完成的稿本基础上,完成了《宋史纪事本末》一书,后又独立完成了《元史纪事本末》一书。这是继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之后,开断代纪事本末之例的一位史学家。还有一位是艾南英,艾氏博及群书,贯通古今,曾以一人之力,编成古今全史一千余卷,可惜的是,晚年遭逢易代,这部全

史连同他的其它著作为兵火所毁,片纸无存了。此外还有邓元锡曾著有《函史》和《明书》,张自勋著有《廿一史独断》,他们的著述曾得到当时人的称誉,然而,时至今日,这些史书很难看得到,已经存佚不详了。

清代江西史学较之明代有所振起,首先应提到的是历仕康、雍、乾三朝的朱轼,他多次任《圣祖实录》、《世宗实录》的总裁官,又任过《明史》的总裁官,他著有《史传》三篇,裁定义例,多所折衷,为世人所推重。其后则有谢启昆与彭元瑞,谢启昆是一位著名的方志学家,他主修《广西通志》,发凡起例,每多创获,成了地方志中的一部名著。彭元瑞曾充任清廷三通馆的副总裁和总裁,精于史学,他不满意于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,认为过于简略,因仿效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的体例,以补注的形式加以充实。积稿有年,可惜未及成书而卒。后来由他的门人刘凤诰继其遗志,为之续撰,刘凤诰以十年之力,先博采宋人载籍,收集资料,后又取文澜阁四库书加以详校,反复订补,倾注了大量心血,终于著成《新五代史补注》,可以说,他是研究五代史的一位功臣,也是清代江西史学界的代表人物。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,江西史学界还应提到三个人:李有棠、文廷式和胡思敬。李有棠也曾集十年之力,撰成《辽史纪事本末》与《金史纪事本末》两书。参考书籍达数百种,考异之文占全书大半,爬梳考订,殊见功力。文廷式著有《纯常子枝语》(其中有史部部分)、《补晋书艺文志》、《元史西北地附录考》等,又著有笔记多种,颇具史才。胡思敬著有《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》、《国文备乘》、《戊戌履霜录》等,其人钻研经史颇深,兼及究心理学,思想陈腐,极力反对维新立宪,故与文廷式恰相对立。不过,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时论著作中,获得不同角度的视野,有助于对晚清历史作较深入的了解。

进入二十世纪,江西史学界出了一颗耀目的巨星,这就是陈寅恪。陈寅恪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史学家,他的史学著作可谓闳中肆

外,见微知著,解蔽发复,提要钩玄,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推崇。像这样的一颗巨星,当然不能用江西史学来范围他,他不但是中国史学的巨星,也是世界史学的巨星。他的史学著作所取得的成果,固然值得珍视,而他的史学方法则尤其值得宝贵,从这一方面来说,他的嘉惠后学、沾溉来者,将是无穷尽的。

我之所以要把江西史学发展状况作一番极其粗略的介绍,目的就是要为本书——《江西古文精华丛书·史学卷》作一点导引的工作。使读者在翻阅本书之前,对江西史学有一点浅近的了解,知道江西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,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,然后一篇篇地去接触原文,从而达到更深入的了解,并进一步受到熏陶,获得裨益。当然本书所选的史论文章,并不仅仅限于上面所提到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,有相当多的入选文章,其人并非专门史家,但其文则属史论(包括方志学),所以本书的视野更宽,取材更广,这是很有必要的。我的这一番介绍,只是画上一条纵线,并非本书入选文章的提要,希望读者在通读本书以后,有所会通,有所增益,将来就可以写出一部更丰富、更完备的江西史学史了。

本书的编定,从选材到注释,都是周秋生同志以一人之力完成的。秋生同志青年时期就读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,曾从我受业,毕业后留校任教,专攻历史文选与中国史学史。他在大学读书时,就是一位纯朴好学的青年,这十多年来,力求上进,治学更勤,终日埋头书案,寝馈其间,物竞不起,利欲不萌,甘于寂寞,默默奉献,诚为常人所不易企及的。此次出其余力,研讨江西史学,从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中,选出若干篇有关史论文章,加以评介和诠释,裒为一册,以飨读者。诠释古书,实非易事,稍有不慎,即将招来郢书燕说之诮,幸秋生同志始终审慎,不敢稍懈,数易其稿,终底于成。我嘉其治学之勤,执着之固,际此书出版之日,为赘数言,以弁其端。此序。

1996年8月30日于南昌北面斋。时年七十又二。

目 录

《江西古文精华丛书》总序 《史学卷》序

周奎书 1
姚公骥 8

北 宋

陶 岳

《五代史补》序 1

欧阳修

《崇文总目》叙释(选
五则) 4

《新唐书·本纪》论
赞(选三则) 10

《唐六臣传》论赞 15

《集古录跋尾》(选三则) 21

曾 巩

《南齐书》目录序 26

史 官 30

唐 论 33

刘 敞

封建论 38

刘 攽

与王深甫论史书 44

刘 恕

《资治通鉴外纪》序 47

王安石

读《江南录》 57

周秦本末论 60

曾 肇

汉文帝论 62

刘義仲

《资治通鉴·问疑》
序、跋 66

刘 弇

策问(两则) 75

讲《春秋》序(节选) 80

南 宋

汪 藻

乞修日历状 86

洪 迈

《容斋随笔》论史(选